

本专著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163020)最终研究成果

失地农民关键生计要素的关系研究 及其结构方程模型的构建

基于江西的抽样调查以及SPSS与AMOS的使用

ShiDi NongMin Guan,Jian Sheng,Ji YaoSu De GuanXi Yan,Jiu
JiQi JieGou FangCheng MoXing De Gou,Jian
JiYu JiangXi De ChouYang DiaoCha YiLi SPSS Yu AMOS De ShiYong

黄建伟/著

中国财经出版传媒集团



经济科学出版社
Economic Science Press

本书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163020）最终研究成果

失地农民关键生计要素间的关系研究 及其结构方程模型的构建

——基于江西的抽样调查以及 SPSS 与 AMOS 的使用

黄建伟 著

中国财经出版传媒集团



经济科学出版社
Economic Science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失地农民关键生计要素间的关系研究及其结构方程模型的构建: 基于江西的抽样调查以及 SPSS 与 AMOS 的使用 / 黄建伟著.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7. 3
ISBN 978 - 7 - 5141 - 7906 - 4 (2017. 10 重印)

I. ①失… II. ①黄… III. ①农民 - 生活 - 研究 - 中国 - 现代 IV. ①D422. 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69191 号

责任编辑: 白留杰 刘殿和
责任校对: 徐领柱
责任印制: 李 鹏

失地农民关键生计要素间的关系研究及其结构方程模型的构建

——基于江西的抽样调查以及 SPSS 与 AMOS 的使用

黄建伟 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社址: 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编: 100142

教材分社电话: 010 - 88191354 发行部电话: 010 - 88191522

网址: [www. esp. com. cn](http://www.esp.com.cn)

电子邮箱: [bailiujie518@126. com](mailto:bailiujie518@126.com)

天猫网店: 经济科学出版社旗舰店

网址: [http://jjkxcbs. tmall. com](http://jjkxcbs.tmall.com)

北京密兴印刷有限公司印装

710 × 1000 16 开 14. 25 印张 250000 字

2017 年 7 月第 1 版 2017 年 10 月第 2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141 - 7906 - 4 定价: 42. 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电话: 010 - 88191510)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 - 88191586)

电子邮箱: [dbts@esp. com. cn](mailto:dbts@esp.com.cn))

序

失地抑或被征地农民生计问题是当前我国农村最敏感、最突出、最棘手的经济社会问题之一，其核心在于如何实现失地农民生计的可持续性。因此，著作围绕失地农民的关键生计要素开展探索，揭示失地农民生计资本、生计政策和生计能力间的相互关系及其作用机理，并据此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既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又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失地农民生计问题，在江西这一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发展时期的省份而言，很具代表性和典型性。土地对于农民而言，具有生存、保障和发展的多重性生计功能。因此，该专著结合在江西省所开展的农户生计问题之调查，研究揭示失地农民的生计问题，更具有普遍性特征。

黄建伟教授完成的《失地农民关键生计要素间的关系研究及其结构方程模型的构建》这一著作，以结构方程构建和应用为核心，揭示失地农民关键生计要素的内在关系。所形成的结论，对于更深刻地认知失地农民生计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参考和方法借鉴。该著作研究成果表明：

一是关键生计要素之间存在密切的关联关系。“生计政策”能对“生计能力”产生直接和间接的正面影响。“生计政策”除了直接作用于“生计能力”外，还通过影响“生计资本”间接地作用于“生计能力”。因此，著作研究认为“生计资本”是“生计政策”对“生计能力”产生双重叠加效应的重要因素。

二是合理的补偿机制是生计能力的重要体现。研究表明，“非货币补偿政策”和“货币补偿政策”分别与“博弈能力”和“生存能力”互为影响，其中前一对关系为正相关，后一对关系为负相关。因此，需要有多元化的补偿机制。

三是重视“生计能力”和“生计资本”的共同作用。研究表明，要使“生计政策”对“生计能力”的提高产生尽可能大的政策效果，不仅应该重视该类政策如何直接作用于这种能力的提高，还要十分重视该类政策如何作用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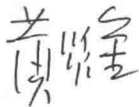
“生计资本”的提高，从而间接地将该类政策的效应传递给这种能力的释放，以提高该类政策的总体效能和实现该类政策的最终目标；“非货币补偿政策”是最重要的“生计政策”，“非金融资本”是最重要的“生计资本”，“生存能力”是最重要的“生计能力”；对于“生计能力”的提高而言，“非货币补偿政策”的政策效果要比单纯的“货币补偿政策”的政策效果更好。

本著作研究的学术意义着重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创新性地细化了失地农民生计的内涵，从而更为科学地描述了生计政策、补偿政策等对失地农民生计能力、生计资本的影响。二是结构方程模型的工具和方法在本项目中的应用为同行提供了重要的范例，有利于促进该研究方法的发展。本项目的最终成果不仅是一部验证和探讨科学问题的学术作品，也是一部通过研究实例介绍统计软件 SPSS 和 AMOS 并以 AMOS 为主的使用和操作的“工具书”。三是提出了以善待失地农民为基础的友好型生计政策。专著中友好型生计政策是指不仅具有针对性，还具有既有实效又能被失地农民广为接受之特点的政策。具体而言，这种友好型的生计政策不仅注重政策配套，还注重政策均衡。同时，还要将通过有效的生计政策，促进和引导失地农民生计资本的积累，纳入政府征地的重大决策部署。

黄建伟教授作为一名长期致力于研究失地农民问题的中青年学者，在该研究领域具有较好的研究积累。本专著作为其失地农民问题研究的延续，其对该问题的深入研究既是基于原有的研究基础，同时又是对原有研究在方法上、内容上及学术思想上的一种突破。其克服困难的勇气和认真的研究态度难能可贵。

失地农民的生计，在不同的时空阶段有不同的表现特征或具体内涵。衷心希望黄建伟教授，在现有创新性研究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和发展失地农民生计的理论与方法，不断拓展研究成果应用的地域空间，从而不断取得更多、更好的研究成果。以此共勉。

南京大学国土资源与旅游学系博士生导师、教授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国土地学会副理事长



2017年5月30日

目 录

第 1 章 研究综述	(1)
1.1 研究意义	(1)
1.2 国内研究现状及发展动态分析	(3)
1.3 国外研究现状及发展动态分析	(7)
1.4 结论	(9)
第 2 章 研究论证	(12)
2.1 研究内容	(12)
2.2 研究方案	(16)
2.3 可行性分析	(18)
第 3 章 信度检验	(26)
3.1 抽样方法	(26)
3.2 样本分布	(26)
3.3 标记变量	(28)
3.4 信度检验	(31)
第 4 章 模型构建	(72)
4.1 分数加总	(72)
4.2 变量制作	(74)
4.3 数据处理	(80)
第 5 章 报表分析	(86)
5.1 浏览完整构建模型的路径系数	(86)
5.2 输出模型报表	(86)
5.3 回归系数分析	(88)

5.4	违反估计分析	(89)
5.5	正态性检验	(91)
5.6	异常值处理	(92)
5.7	模型内在质量判断	(94)
5.8	拟合度指标分析	(97)
第 6 章	模型修正	(100)
6.1	释放限制	(100)
6.2	模型精简	(107)
第 7 章	研究结论	(132)
7.1	关于研究假设	(132)
7.2	关于模型拟合	(134)
7.3	关于模型解释	(135)
7.4	关于概念界定	(138)
7.5	关于政策建议	(141)
附件一	江西省十一个地级市抽样选点信息表	(146)
附件二	信度检验前使用的调查问卷	(150)
附件三	信度检验后使用的调查问卷	(166)
附件四	模型修正后精简模型使用的调查问卷	(177)
附件五	模型修正后精简模型的输出结果	(188)
附件六	作为课题研究延伸阅读的文献计量	(200)
参考文献	(217)
后记	(219)

第1章 研究综述^①

1.1 研究意义

新中国成立近70年以来,我国城市化水平大幅提高,城市个数由新中国成立前的132个增加到2008年的655个,城市化水平由1949年的7.3%提高到2008年的45.68%^②。到2030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将达到70%左右。那将意味着,除了要解决上一轮发展中累积的问题,还要解决近4亿农民的城市化^③。实际上,我国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是以广大农民失去大量赖以生存的土地为代价的。受“城市经营理论”的影响,地方政府热衷于搞“土地财政”,盲目追求城市化水平,近年来,我国城市化进程迅速推进,征用了大量农村集体土地,产生了大量“种田无地、就业无岗、社保无份”的失地农民。从经验数据来看,每征用0.067公顷(1亩)耕地,就产生1.5个失地农民。据学者推算,目前,我国失地农民人数应在5100万~5525万,再加上因农村超生等原因没有分到土地的“黑户口”劳动力,这个数目则逾6000万^④。还有学者指出,按照我国现有的城市化水平和经济发展速度,今后每年仍需征用农地16.7万~20万公顷,每年将新增失地农民375万~450万人,10年后失地农民总数将接近1亿人^⑤。目前,60%失地农民的生活十分困难,有稳定经济收入、没有因失地影响基本生活的只占30%^⑥。在此背景下,以可持续生计理论为支撑,研究失地农民关键生计要素的关系、建立科学的生计模型并据此向党

① 黄建伟. 失地农民生计研究现状及其动态分析 [J]. 商业研究, 2011 (7): 140-144.

② 统计局: 建国60年我国城市化水平提高5倍多 [EB/OL]. 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09-09/18/content_12075777.htm, 2009-09-18.

③ 刘守英. 谁的城市化? [J]. 中国改革, 2010 (6).

④ 杨涛, 施国庆. 我国失地农民问题研究综述 [J]. 南京社会科学, 2006 (7): 103.

⑤ 何格, 等. 合理安置失地农民的构想 [J]. 农村经济, 2005 (1): 42.

⑥ 中国4000万失地农民流荡城市 [N]. 青年参考, 2004-04-14.

和政府提出解决我国失地农民的可持续生计问题的政策建议显得十分必要。

由于失地农民利益受损和生计不可持续,近几年因失地引起的越级上访事件和群体性突发事件甚至“流血”与“自焚”事件时有发生,“警民”关系因此更加紧张,“官民”矛盾也更加尖锐,严重影响了社会和谐和农村稳定,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还影响了党和政府的形象。温家宝总理曾在《求是》撰文强调:“目前不少征地项目不给农民合理的补偿,不妥善解决农民的生计,造成农民失地失业,危及农村社会稳定。不少地方乱占滥征耕地,随意圈地,有的地方征地规模过大。这些问题必须引起高度重视”^①;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樊平认为:“我国失地农民问题严重,反映强烈,成为影响当前农村社会稳定的第一位问题”^②;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于建嵘指出:“我国农民失地失业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农村经济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更是一个严重的社会政治问题”^③;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童星教授认为:“数以万计的‘流民’是能够蕴藏巨大能量的,因农民失地而可能引发的政治合法性危机已露端倪”^④。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刘守英认为:“土地问题已成为威胁社会稳定的首要因素,对政权巩固的影响不可小视,必须加快制度改革步伐”^⑤。农民失地引起的社会问题至今还十分严重,党和国家领导人十分重视。2011年1月24日,共和国总理首次与来京上访群众进行面对面交流。在听完村民反映农村土地征用和房屋拆迁的问题后,温家宝总理指出:“土地资源十分宝贵,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政府必须严格依法审批占用耕地的项目,依法征用农村土地和宅基地,必须保障农民的知情权,尊重农民的意见,给予农民合理补偿,保障农民的权益”^⑥。实际上,保障失地农民的权益关键是要通过合理的政策设计保障其生计可持续。其生计是否可持续,不仅是关系到其未来的生存和发展,更关系到

① 温家宝. 认真贯彻十六大精神 为推进农村小康建设而奋斗 [J]. 求是, 2003 (3): 5.

② 汝信, 陆学艺, 李培林. 2005年: 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 317.

③ 于建嵘. 农民失地失业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 [J]. 探索与争鸣, 2004 (1): 10.

④ 童星, 马西恒, 王毅杰, 严新明, 张海波. 交往、适应与融合——一项关于流动农民和失地农民的比较研究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 233.

⑤ 刘守英. 谁的城市化? [J]. 中国改革, 2010 (6).

⑥ 中国政府网. 温家宝到国家信访局就政府工作听取来京上访群众意见 [EB/OL]. http://www.gov.cn/ldhd/2011-01/25/content_1792332.htm, 2011-01-25.

社会风险产生的初始大小和加速度^①。解决好失地农民生计问题,才能保证征地拆迁的安定和谐,从而尽可能减少不和谐因素。因此,研究失地农民关键生计要素的关系、建立科学的生计模型并据此向党和政府提出解决我国失地农民的可持续生计问题的政策建议还显得十分紧迫。

另外,从纯学术的角度看,结构方程模型的工具和方法在本书中的应用还能促进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定量分析方法的发展。同时,本书的任务不仅在于研究失地农民关键生计要素(生计资本、生计政策、生计能力)间的关系、建立相应的结构方程模型并据此提出解决失地农民可持续生计的具体政策方案,而且还在于发现和传播短期内不会成为某些地方政府政策制定过程中所缺乏的学术思想,如“可持续生计”“善治”等思想。本书的研究坚定不移地追求长远目标,而不是眼前利益,并且着眼于未来,注重发掘社会发展的新思想,寻找社会发展的潮流,使决策者逐渐接受这些思想^②。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本书研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较高的理论价值。

1.2 国内研究现状及发展动态分析

2011年2月20日,笔者在中国知网中的“中国学术文献网络出版总库”(网址为:<http://epub.cnki.net/grid2008/index/ZKCALD.htm>)输入相应的目标文献内容特征(题名含“失地农民”或含“被征地农民”这两个关键词)后进行检索,检索结果显示,相关文献共有6984篇,其来源数据库的文献数量情况如下: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2903篇、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16篇、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415篇、中国重要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134篇、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2980篇、中国年鉴网络出版总库536篇。另外,笔者在“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和“卓越网”检索到已出版的有关专著(即专著书名包含“失地农民”或“被征地农民”这两个关键词)共20部。以上数据表明,当前国内有关失地农民问题研究的文献已经相当丰富。在以上文献中,有部分学者以“可持续生计”的理论为“分析工具”和“理论支点”,专门研究失地农民的生计问题。笔者通过对以上与失地农民

① 罗蓉. 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可持续生计问题研究 [D]. 成都:西南财经大学, 2008: 1-2.

② 陈振明. 政策科学——公共政策分析导论 [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109.

“可持续生计”问题相关性强的部分文献^①的认真梳理，发现以上文献主要对以下七个问题进行了探讨。

(1) 失地农民可持续生计的定义。可持续生计是指个人或家庭为改善长远的生活状况所拥有和获得的谋生能力、资本和有收入的活动。学术界在研究失地农民可持续生计问题时，大多数学者认同并引用了该定义（如黄河，2005；张时飞，2006；刘家强，2007；王慧博，2008；赵兴玲，2009等）。虽然有学者（如李炜，2006；王作安，2007；袁斌，2008）对该定义的表述有所不同，但对这个概念的基本思想的理解是一致的。

(2) 失地农民可持续生计的特征。现有的文献将失地农民可持续生计的特征概括为“三性”：即延续性、发展性和正义性（王明英，2006）。

(3) 失地农民可持续生计的分析框架。在失地农民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的研究中，学术界倾向于使用英国国际发展机构（UK's 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DFID）建立的可持续生计框架——DFID模型（如成得礼，2008）。学者黄建伟在成得礼研究的基础上，对DFID模型进行了修正，基于失地农民的脆弱性背景（即失地、失业、失保、失权、失身份）建立了反映失地农民生计要素即生计资本、生计政策和生计能力之间关系的分析框架（黄建伟，2009）。

(4) 失地农民可持续生计的评价指标。胡初枝等提出的“两保”的评价体系和量化标准（胡初枝，2008）对研究失地农民可持续生计问题具有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尤其是其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的创新十分值得肯定，但有几个问题是值得商榷的：如指标的类型划分是否合理？指标的类型是否偏少？权重系数的设置是否有科学依据？评价体系和量化标准是否具有普适性？

(5) 失地农民可持续生计存在的主要问题。根据国内学者的研究，我国失地农民可持续生计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补偿安置问题、就业和创业问题、收支问题、社会保障和权益保障问题及身份窘境问题（朱秀变、崔志坤，2005；张时飞，2006；王文川、马红莉，2006；王明英，2006；周焕丽、惠永智、王玉，2007；刘润彩，2008；于全涛，2008）。

(6) 失地农民可持续生计的影响因素。国内现有文献在研究失地农民可持续生计的影响因素时大多采用规范研究和定性分析的方法，但也有学者使用

^① 本书花了近一年时间对相关文献进行收集、整理和筛选，发现相关性强的文献即用“可持续生计”理论来分析失地农民问题的文献不超过100篇。

了实证研究和定量分析的方法。在规范研究和定性分析中,有学者认为,失地农民可持续生计的影响因素包括经济资本匮乏、社会资本短缺、人力资本不足和传统人际关系资本弱化等(王慧博,2008);也有学者认为,存量货币(一次性土地补偿费)、职业、社会保障的不可持续和文化适应滞后影响了失地农民的可持续生计(刘晓霞,2008);还有学者认为,影响失地农民可持续生计的因素中,既有主观方面的原因,也有客观方面的原因(赵兴玲,2009)。在实证研究和定量分析的方法中,有学者经过因子分析、信度检验、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对相关假设进行了验证,并构建了数据模型,其研究表明,土地征用费类因素、土地赔偿费类因素及政策支持和保障措施都会对失地农民的可持续生计产生显著的积极影响(袁斌,2008)。

(7) 解决失地农民可持续生计问题的对策。针对失地农民可持续生计存在的问题和其影响因素,在“可持续生计”理念的指导下,我国学术界至少提供了十种解决失地农民可持续生计问题的思路(黄建伟,2011):一是实现充分就业的思路;二是鼓励自主创业的思路;三是转换农民角色的思路;四是落实社会保障的思路;五是完善补偿机制的思路;六是积累家庭资产的思路;七是保护合法权益的思路;八是创新现有制度的思路;九是建设内源社区的思路;十是转变传统观念的思路。

十分可喜的是,失地农民问题的研究成果不仅数量可观,而且在失地农民生计方面的研究越来越深入,不少学者在探讨以上七个方面的问题的同时,也十分关注失地农民生计要素间的关系研究,尤其是在其关键生计要素如生计资本、生计政策和生计能力间的关系研究方面有所建树。有学者根据我国失地农民的实际情况,对可持续生计的DFID模型进行了修正,修正的模型显示了生计资本、生计政策与生计能力之间具有较强的相关性(罗蓉,2008;黄建伟,2009)。

在生计资本与生计能力的关系研究方面,我国学者已经得出以下相关的研究结论:(1)人力资本影响就业能力。如有的学者认为,随着科技进步和城市产业结构升级,城市对劳动力的需求不再是简单的体力劳动者,人力资本存量低对失地农民就业的约束会表现得越来越强烈(李洁,2010)。但同时认为,就业能力是一种可以通过教育性人力资本的投资如教育培训等得到提升的职业能力(尹奇,2010;李洁,2010)。有研究显示,失地农民的人力资本低下是其未能就业的主要原因(李琴、孙良媛、罗凤金,2009)。在中国大中型城市的城乡结合部地区,失地农民的人力资本水平通常对其就业或劳动供给具有显著的积极或正向影响(邓国取,2009;谢勇、徐倩,2010)。(2)社会资

本影响就业能力。失地农民要实现就业，不仅要靠他们的人力资本，还要靠他们的社会资本（沈关宝、李耀锋，2010）。（3）金融资本和自然资本影响创业能力。有学者认为，资金短缺是制约失地农民创业的关键（中国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课题组、董沿，2007）。还有学者认为，所处区域是否具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气候条件等都是影响创业的重要因素（韩志新，2009）。

在生计政策与生计能力的关系研究方面，我国学者已经得出以下相关的研究结论：（1）生计政策（如制度安排）影响可行能力。可行能力是社会成员在若干活动领域所拥有的选择自由，不同的社会群体拥有的可行能力水平差异极大，这首先取决于社会的制度安排，制度规定的一系列资源配置规则和机会分配规则对于群体的可行能力具有首要的决定作用（徐琴，2006）。因为作为一个客观事实，失地农民的确文化程度不高、缺乏劳动技能、社会支持网不发达等。但是，如果从形成的原因来看，显然与我国长期以来“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二元结构以及分割的户籍管理制度、福利保障制度、就业和教育等一系列的社会安排有密切关系（陈雷、张陆伟、孙国玉，2010）。（2）生计政策影响就业能力。失地农民单凭自身努力很难找到适合的工作，生活也由此不同程度地陷入困境。这就对国家相关部门出台政策以支持其就业提出了迫切需要（张汝立、黄瓚，2007）。经济参与能力的核心是就业竞争力，对于失地农民而言，此项能力的短缺不仅因为自身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不足，更与一系列排斥性的制度安排有关（徐琴，2006）。有研究显示，社会保障体系、就业安置政策、土地补偿政策、教育政策等生计政策均为影响失地农民就业能力的因素（王轶、宗晓华，2009）。（3）创业能力的提升需要创业政策的支持。有学者认为，政府需要通过制定和实施良好的创业政策加强对创业企业的支持，推动创业活动的开展并提高其成功的可能性（韩志新，2009）。提升失地农民创业能力需要提供的政策支持至少应该包括提供项目支持、服务支持和金融支持（邓国取，2009）。（4）参保政策影响参保能力（如参保意愿）。有研究表明，政策宣传力度不够和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存在缺陷，是失地农民参保意愿低的主要原因（张盈华、杜跃平，2007）。

在生计政策与生计资本的关系研究方面，我国学者已经得出以下相关的研究结论：（1）土地及其相关政策影响生计资本。有研究表明，与生计有关的政策对生计资本的存量和积累影响显著。如有学者得出如下结论：土地及其相关的制度是决定农民生计安排的关键因素……从某种意义上讲，失地农民的生计资本贫乏很大程度上来自于生计制度的贫困（罗蓉，2008）。（2）补偿政策

影响金融资本。有学者认为,土地征用赔偿制度是决定失地农民理性安排土地收益(金融资本)的重要保证(刘家强、罗蓉、石建昌,2007)。(3)社保政策影响人力资本。有研究认为,制定医疗保险政策,为失地农民建立适宜的医疗保险对于降低他们的疾病风险、提高其人力资本的数量和质量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嘉蓉梅、李燕琼,2006)。

1.3 国外研究现状及发展动态分析

与国内学者的研究相比,国外学者尤其是西方学者近二三十年来对失地农民进行的研究相对较少。国外学者对失地农民问题的研究主要出现在国内学者对国外学者相关研究的零散介绍中。其主要原因在于西方社会早已度过了城市化与工业化的阶段进而转向后现代与后工业化的发展,失地农民问题已非西方社会所要关注的核心议题。西方国家大多实行的是土地私人所有制,这一点与中国的土地集体所有制有根本不同,尽管如此,有关国外的研究对于中国关于失地农民的制度安排与实践仍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①。

笔者在 EBSCO 学术资源检索平台检索后发现,有少量国外学者关注拉美和亚洲的失地农民问题。如有的学者介绍了巴西土地改革和“无地农民”运动的情况(Laws, Forrest, 2003; Plakans, Andrejs, 2006);又如有的学者介绍了玻利维亚将荒地分配给无地农民并给予免税和免征的土改议案(Sarah Lazare, 2006);再如有的学者介绍了菲律宾无地农民的生计现状并在 *Nation* 中写道:“菲律宾的耕地改革迫在眉睫。在一个 70% 的人口都是农民的国度,不低于 7/10 的农民无法拥有属于他们生计的土地……他们注定了贫穷”(Collins、Joseph, 1987)。另外,中文文献中还能检索到少量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如韩国学者朴商道(复旦大学行政管理专业留学生)在《上海行政学院学报》上发表论文介绍了韩国政府对失地农民的诸多政策,如社会保障、科技农业教育及金融贷款政策等并与中国的农地征收政策作了比较(朴商道,2007)。

对国外相关文献的讨论,我国学者张汝立作了较好的概括(张汝立,2006)。张汝立认为,关于英国的“圈地运动”给失地农民造成的不良影响,曾有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研究(芒图,1983;克拉潘,1980;豪斯赫尔,1987;考特,1992,等)。有学者指出:“圈地使畜群肥,使穷人瘦”。马克思

^① 李航. 征地过程中失地农民与地方政府的社会交换 [D]. 上海大学, 2010: 18.

和恩格斯对此也有精辟的论述：“他们大批地变成了乞丐、盗贼、流浪者，其中一部分人是由于习性，但大多数为环境所迫”。^①另外，张汝立还对国外学者（如帕克，1987；哈里森，1984；阿明，1990；普雷维什，1990；托达罗，1992）对美国、拉美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政策给失地农民造成不良影响的研究进行了综述。另外，我国学者陈传锋（2005），汤志林、陈芳（2007），沈关宝、王慧博（2008）等对国外学者的相关文献也进行了必要的讨论。有研究认为，国外学者对土地问题和失地农民问题的研究已从单一的土地交易、土地改革、失地农民问题等点线研究转向了系统研究，开始重点研究与土地相关的各种关系和各个系统，重视弱势群体的合法土地利益，重视从多视角解决土地冲突，着手优化政府土地管理，遏制土地腐败等（沈关宝、王慧博，2008）。虽然国内外的土地制度存在较大差异，但笔者仍然认为国外的相关文献对研究我国失地农民问题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尽管国外关于失地农民问题研究的相关文献不多，但关于“可持续生计”（Sustainable Livelihoods）的研究文献却相对丰富。而国外的“可持续生计”理论实际上成了我国学者研究失地农民问题的重要“分析工具”和“理论支点”。在我国，可持续生计的理论主要用来指导解决失地农民问题（黄建伟，2009）。在此，笔者有必要对国外关于“可持续生计”的研究现状及发展动态进行简单分析。

“可持续生计”概念最早见诸1991年世界环境和发展委员会的报告：“它从一开始就是要维系或提高资源的生产力，保证对财产、资源及收入活动的拥有和获得，而且要储备并消耗足够的食品和现金，以满足基本的需要”（唐钧，2005）。1992年，联合国环境和发展大会（UNCED）将此概念引入行动议程，在第21项议程中指出，稳定的生计可以使有关政策协调地发展、消除贫困和可持续地使用资源（纳列什·辛格，2000）。在1995年社会发展峰会上通过的《哥本哈根宣言》中是这样表述的：“使所有男人和妇女通过自由选择的生产性就业和工作，获得可靠和稳定的生计”（唐钧，2004）。

在国外，“可持续生计”的研究文献已有一定的数量。笔者在EBSCO学术资源检索平台就检索到282篇题名含有“Sustainable Livelihoods”这个关键词的文献。学术界对“可持续生计”概念的理解是建立在对“生计”概念的理解的基础之上的。其中Chambers和Conway关于“生计”的概念为学术界

① 马克思·资本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843.

定“可持续生计”的概念奠定了最坚实的基础。Chambers 和 Conway 将“生计”定义为是一种谋生的方式，该谋生方式建立在能力（Capabilities）、资产（Assets）（包括储备物、资源、要求权和享有权）和活动（Activities）基础之上（Chambers & Conway, 1992）。尽管国外其他学者对生计概念的具体表述有所不同，但在关键生计要素的认识上基本一致：即将资产或资本、权力或政策、行动或能力看成是其核心部分。如 Ellis 在强调农村生计多样化的研究中认为以上三大生计要素决定了个人和农户的生活获取（Ellis, 2000）；又如 Scoones 在强调生计的可持续性研究时给出的生计定义也包含了以上三大生计要素（Scoones, 1998）。另外，Sen 十分重视人的可行能力，他把能力看作是人能够生存和做事的功能（Sen, 1997）。能力的引入不仅扩大了生计概念的范畴，还使人们在解决贫困人群的生计问题时更加重视人本身能力的发展。在国外，可持续生计一般被定义为“个人或家庭为改善长远的生活状况所拥有和获得的谋生的能力、资产（物质的和社会的资源）和有收入的活动（Chambers and Conway, 1992）。如果能够应付压力和冲击且恢复，并且在不过度消耗其自然资源基础的同时维持或改善其能力和资产，那么该生计具有持续性”（Farrington, Carney, Ashley & Turton, 1999）。以上可持续生计的理论被国际社会广泛用于解决贫困人群的生计问题并发展成了多种分析框架。如英国国际发展机构（UK's 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DFID）、可持续性农村生计咨询委员会（Sustainable Rural Livelihoods Advisory Committee）、Scoones（1998）、Carney（2002）、Ellis（2000）、Bebbington（1999）等均提出并发展了可持续生计的分析框架。这些分析框架不少是以资本、能力、政策（制度）为核心来分析贫困群体的生计问题。在众多的框架中，英国国际发展机构2000年建立的SL框架——DFID模型较为出色和典型^①，已经被许多组织采纳。

1.4 结 论

1.4.1 国内失地农民可持续生计问题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进展

综上所述，国内研究失地农民问题的文献已经相当丰富，但用“可持续

^① DFID.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Guidance Sheets. 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2000.

生计理论”来研究失地农民问题的研究文献相对较少。尽管如此，我国失地农民可持续生计问题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进展：国内相关文献界定了“可持续生计”的定义，概括了失地农民可持续生计的特征，建立了失地农民可持续生计的分析框架（DFID模型），提出了失地农民可持续生计的评价体系和量化标准，分析了失地农民可持续生计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影响因素，提供了解决失地农民可持续生计问题的多种思路。十分值得肯定的是，国内学者对失地农民关键生计要素如生计资本、生计政策和生计能力间的关系研究方面有所建树，如对生计要素间的具体关系进行了初步探讨。可以认为，国内学者对失地农民关键生计要素间的关系研究已有一定的理论基础。

1.4.2 国外的相关研究成果为本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

虽然近年研究失地农民问题的国外文献不如国内文献丰富，但国外的现有研究成果仍然对我国学者研究失地农民问题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尽管西方社会早已度过了城市化与工业化的阶段进而转向后现代与后工业化的发展，失地农民问题已非西方社会所要关注的核心议题，但关注贫困人群的生计问题仍然是其重要的使命，因此国外尤其是西方学者和有关机构提出并发展了“可持续生计”的理论模型和分析框架。而该理论模型和分析框架正是我国学者研究失地农民生计问题的“理论支点”和“分析工具”。尽管国外学者对生计概念的具体表述有所不同，但在关键生计要素的认识上基本一致：即将资产或资本、权力或政策、行动或能力看成是其核心部分。可持续生计的理论被国际社会广泛用于解决贫困人群的生计问题并发展成了多种分析框架。这些分析框架不少是以资本、能力、政策（制度）为核心来分析贫困群体的生计问题。因此，笔者可以认为国外的研究成果为本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

1.4.3 我国失地农民生计问题的研究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

毋庸置疑，国内对失地农民可持续生计问题的研究已经取得一定的成果。但在看到成果的同时，笔者也不得不承认，国内的相关研究存在以下几个问题：一是系统的相关研究较少。国内相关文献大多数是期刊论文、硕士论文和报刊文献，而系统研究该问题的专著、博士学位论文相对偏少。二是对失地农民关键生计要素间的关系研究仍然不够深入和系统，尤其是对其关键生计要素间的具体关系缺乏深入细致的科学验证，对其生计规律也缺乏系统的论证。这些研究缺陷的存在不利于决策者进行科学决策。三是研究方法的单一和研究工